

河南省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

梁常运 周怡洁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对兰考县结合教育实践活动抓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希望他们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不断取得事业发展新成绩。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二起来”的重要论述。

一、县域富民产业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2025年河南省委一号文件指出,持续培育县域富民产业。县域富民产业是充分依托县域优势资源,延长既有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县域内形成的参与程度高、带动能力强、城乡同步、三产融合的产业体系,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性,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持续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县域富民产业主要包括:以农业为主的富民产业、以工业为主的富民产业、以文旅融合为主的富民产业、以商贸物流为主的富民产业、以农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富民产业。

二、新质生产力

2023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此后又在多个重要场合作了深入论述。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重要任务,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次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举措写进了中央文件。

2025年5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20日上午听取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河南作为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要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河南省委提出了“1+2+4+N”的目标任务体系(“1”是一个奋斗目标,即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2”是“两高”总体任务,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动高效能治理;“4”是“四着力”重大要求,即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N”是落实“1+2+4”的一系列工作要求,根据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新任务等,不断进行拓展深化、充实完善、动态更新,如“建设农业强省、制造强省、数智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扎实推进科教强省进程”。

三、河南省县域富民产业新质生产力

(一)关于发展以农业为主的富民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

业新质生产力,这不仅是技术路径的优化,更是农业生产模式的战略转型。2025年9月24日,河南省全面推进农业强省建设现场会在新乡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在会上强调,“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这方面河南省各地都取得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做法,例如新乡县的种业、灵宝的苹果、沁阳沁河区(原沁阳县)的毛尖茶、泌阳的食用菌、内乡的养猪、鄢陵的花卉等。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1/10,其中,用1/4的小麦种植面积生产了全国28%的小麦,近年来小麦年产量都在700亿斤以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省粮食生产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到河南视察,每次必讲“三农”,必讲粮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生产是河南的一大优势,一张王牌,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嘱托我们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河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国家种业、粮食安全需求,作出建设中原农谷的重大决策部署,2022年4月省政府印发《“中原农谷”建设方案》,旨在将中原农谷(一核:平原示范区,三区:获嘉县、新乡县、延津县三个片区)打造成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高地,成为农业科技创新的领航者,更好支撑农业强省建设。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2022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指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集中攻关,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建设中原农谷,促进种业振兴,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经过3年的超常规推进、高标准建设,中原农谷被成功列入全国仅有的3个种业创新基地之一,实现“八大领域”育种全覆盖,205个新品种通过国家、省审定,保藏种质资源20万份,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神农种业实验室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总数达67家,中农发、先正达等种业企业总数达88家,拥有种业研发团队62支、科研人员420名,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在中原农谷布局实验室、试验基地,中原农谷科技孵化中心、中原农谷种子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心等项目建成使用,全种业创新生态初步形成,“三年见成效”目标顺利实现。

2024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察中原农谷时强调,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2025年1月7日,省委书记刘宁调研中原农谷时指出,要聚焦种业种质种苗种群,整合优质科研资源,加大种业关键技术和重点品种研发力度,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上展现更大作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万建民提出:“多学科交叉融合将引领育种技术的快速迭代。‘生物技术(BT)+信息技术(IT)+人工智能(AI)’的深度融合,正催生数字化、智能化的育种新范式。”AI不仅用于基因挖掘和表型预测,更将驱动智能设计育种,通过对株型、抗性、品质等性状进行数字化建模与全局优化,实现“定制化”品种的精准高效培育,这将是未来种业竞争的核心高地。

(二)关于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富民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发挥河南省县域的自身优势,发展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的富民产业新质生产力,例如延津的小麦、温县的山药、通

许的酸辣粉、南阳卧龙区的艾草、光山的山茶油等。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发展功能性健康食品产业。

新质引领,推动茶行业革新升级。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有力支撑。2024年2月28日,河南省委为大别山实验室等在内的新一批省实验室集中揭牌。大别山实验室聚焦“两茶”(茶叶、油茶)科技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重大科技需求、产业关键技术瓶颈,以品种选育、绿色低碳、精深加工、智能装备、医药健康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为核心,通过人才集中、平台搭建,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一系列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造国内“两茶”产业高端人才聚集和科技创新高地,提升“两茶”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关于发展以文旅融合为主的富民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2025年5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着力拓展“低空+文旅”。在2024年全国两会上,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河南省政府也于2024年6月印发了《促进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年)》,加快开辟低空经济发展新赛道。

低空旅游是低空经济的重要融合业态,卫辉市唐庄镇建有通用机场,可以依托太行山生态资源、黄河文化遗产资源,拓展“低空+文旅”应用场景,大力开发“空中看太行”“空中看黄河”等空

中观景体验项目,形成低空旅游产业链,推动文旅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四)关于发展以商贸物流为主的富民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当前制造业正在从“规模生产”转向“柔性创新”,物流的协调升级能够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降本增效,已成为提升供应链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物流的运营能力和水平,机器人、无人机的配送极大地提高了物流的效率。同时,近年来制造业“走出去”(如海外建厂、全球采购、跨境电商)的步伐加快,对国际物流网络的依赖度显著提升,开拓国际市场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动能。卫辉市在这方面做得很有特色,例如中通、德邦布局卫辉市,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五)关于发展以农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富民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农业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提供专业化、市场化中间服务的产业形态,是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农业效率、降低成本和推动产业升级至关重要。农机装备水平的提高与关键词服务,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农业机器人应用等智慧农业服务,农情预警、遥感监测、数字化种植管理服务等都彰显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无人驾驶播种机驰骋沃野,智慧大屏“掌管”万亩良田,植保无人机凌空编织防护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有力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促进了产业融合,提升了农业整体效率。

【梁常运系河南科技学院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怡洁系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河南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新质生产力研究”(项目编号:2025-YYZD-22)阶段性成果】

青年二次元文化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研究

——以上海“谷圈圣地”为例

张国栋

摘要:空间同质化造成后现代个体的生存危机,为此地方建构提供了超越路径。上海“谷圈圣地”是二次元文化消费空间进行地方建构的成功尝试,引入空间地方现象学视角对其机制进行分析,发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共同形塑了空间的物理、情感、文化和社会维度,使之成为赋予青年生存意义的地方。

空间内嵌于人的存在与生活,当空间获得了界定和意义便成为地方。以地方思想审视二次元文化消费空间,不仅是二次元周边商品的交易和消费的功能性场所,更是青年群体锚定情感坐标、进行文化表达和开展社会交往的生存场域。探究这一消费空间如何实现地方建构,有利于了解青年的精神世界和实践样态,为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一、消费空间的地方化:“谷圈圣地”的突围之道

进入后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空间的同质化加剧了个体的生存危机。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空间扩张,使城市沦为效益最大化的装置,极大丰富的物质压制了消费以外多样生存方式的存在;另一方面,文化与商品的结合使得精神活动也以消费为中介表达,符号消费进一步宰制人的生活。由此空间及其中生活的多样性被消费空间的同质化解构了,并在根本上造成了生存的危机。

地方化为超越消费空间的同质化和个体生存的无意义感提供了路径。地方作为承载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的空间,塑造个体生活状态和存在方式的多种可能,地方化就是民众通过经验和实践将空间改造为人性化生活世界的过程。

“谷圈圣地”是青年将二次元文化消费空间建构为地方的生动实践。迪美、百联ZX、新世界和第一百货是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的老牌商综,通过拥抱Z世代青年以二次元文化引导空间转型,找准了市场竞争中的差异化定位,同时也与青年建立起特殊的情感和文化连结,成为Z世代消费、生活和社交的“谷圈圣地”。

本文尝试探究商综转型中的空间重构如何与Z世代青年的实践有机结合,即消费空间的地方化何以可能,为此引入段义孚的空间地方思想分析地方建构的内核及其维度。

二、消费空间地方建构的内核与维度

在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加快步伐的背

景下,消费空间的再生产循着资本、权力和地方共同设定的框架展开。当前学术界对于消费空间再生产的研究主要强调自上而下的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相对忽视了民众通过实践把死寂空间转化为鲜活地方的人本逻辑。

段义孚的空间地方现象学为理解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逻辑提供了人文主义视角,在这里“空间”与“地方”构成辩证关系,前者代表开放与可能性并列的生活坐标,而后者代表真实与归属感构成的价值中心。个体能够通过实践将空间情感化为地方,从而以意义赋予解决空间再生产的同质危机和“无地方性”。

空间地方现象学的核心观点,即地方是人类通过经验,将意义注入空间的产物,具体而言是物理、象征、文化和社会四个层面塑造“可见性”的过程,物理维度即空间物理形态、象征维度即空间情感意义、文化维度即空间叙事价值、社会维度即空间群体纽带。

段义孚的理论为消费空间生产的地方逻辑注入意义的内核,并从四个维度给出分析地方建构机制的框架,以下将沿着该理论分析上海“谷圈圣地”何以将地方逻辑融入消费空间再生产,实现“意义地方”的深刻变革。

三、上海“谷圈圣地”的地方建构机制

地方既是主观意义的建构过程,也是客观行为的实践过程。上海“谷圈圣地”之所以完成了地方建构,是由“谷子”这一中介物及青年围绕其展开的实践观察而来。“谷子”(二次元周边)是goods的谐音,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承载了地方的意义内核,作为一种实践形式嵌入主体的空间形塑。

具体而言,“谷圈圣地”的地方建构是自上而下主体和自下而上主体围绕“谷子”开展互动,推动空间层层递进赋予意义之维的过程。

(一)物理维度:空间重构与感知双向奔赴

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以自上而下的空间重构为前提。差异化是地方“可见性”的核心,表现在物理形态上是“谷圈圣地”整体的气氛渲染和局部的地标导引,无论是“表情包”的叠加,还是“名场面”的再现,都精准引导青年的目光和脚步。

自下而上的空间感知借助Z世代“逛谷”被具身在地与空间完成绑定。地方建构依赖前反思性的直接经验,是多感官交织的集合,青年的“逛谷”以视觉为主导,受到二次元要素的引引并循着空间预设的动线移动,在此过程中积累所谓路径知识,而这为地方建构的第一步,即界定空间奠定了基础。

(二)象征维度:情感唤回与依恋的交互

共鸣

自上而下的情感唤回依赖舒适物的排列和供给。“谷子”是满足二次元爱好者情感需求的舒适物形式,商户依据IP类型与角色属性对商品进行分区陈列,这种“数据库”式的提供方便青年对“萌属性”的检索,从而在消费中完成情感投射。

自下而上的情感依恋借助“吃谷”行为完成对空间的情感投射。Z世代青年的“吃谷”并非出于实用性需求,而是以情绪价值与私享悦己为核心驱动,“吃谷”本身具有情感修复与自我确证的仪式属性,“谷子”作为情感内化的物质见证,使其承载空间建构了场所依恋的情感纽带。

(三)文化维度:价值生产与共创的有机共存

自上而下的价值生产表现为“官谷”流通中的经济价值生产。官方“谷子”作为IP衍生商品,其中蕴含全新的文化消费形态,“官谷”由生产端流向消费端,实现了资本循环的关键闭环,成为消费空间产出经济价值的基点。

自下而上的价值共创则表现为“创谷”过程中文化价值溢出。正如东浩纪指出“重视虚构”和“二次创作”是亚文化的两大特征,青年通过想象力产出同人制品在文化商品化逻辑之外拓展了个体的表达方式,他们通过“扩圈”“出活”“无料”分发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赋予空间以Z世代不被定义的叙事价值。

(四)社会维度:社群集聚与连结的协调统一

自上而下的社群集聚借助主题活动提供建构契机。“谷圈圣地”运营方善于捕捉Z世代的潮流趋势,在空间开展相应的主题活动,无论是大众的集换营销、“谷子”市集,抑或是小众的角色应援、IP快闪,都持续营造聚集的话题,为城市中的异质性个体创造共在的空间场域。

自下而上的社群连结显现为圈内认同与跨圈层对话两个层面。圈层化是Z世代消费的重要特征,也展现出其社交的两种面向:在偶遇同好时积极互动,交换无料、合影留念以寻求“小团体”的归属感;而面对同好以外的大多数则选择性忽视,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排斥交流,而是让位于维护群体边界的秩序感。Z世代的有限交往使得“谷圈圣地”具有了不言而喻的社交地标属性,地方的社会交往纽带得以形成。

四、结语

Z世代围绕“谷子”的实践成功将二次元文化消费空间转变为自身存在和生活的地方,其中,青年赋予了空间多样的功能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为自身栖居城市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意义,从而在自主建构意义上解决了后现代的“无地方性”危机。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

构建高校网络谣言治理新机制

周丹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制度框架,然而,高校在治理网络谣言具体执行层面,仍面临制度供给不足、协同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

一、高校网络谣言治理的现实背景和突出特征

互联网深刻重塑了信息传播格局,高校师生作为网络空间最活跃的群体之一,既是信息的高频消费者,也是谣言的易感人群。当前,全媒体时代信息生产主体多元、传播渠道碎片化、算法推荐精准化,使得网络谣言的生成与扩散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网络谣言的渗透与蔓延不仅扰乱校园舆论秩序,更对青年学生的价值认同和思想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从现实看,高校网络谣言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话题聚焦性强,多围绕校园管理、师德师风、招生就业等敏感领域,极易引发群体性情感共鸣;二是传播链条隐蔽化,从公开社交平台向社群、朋友圈等封闭空间延伸,传统监测手段难以有效覆盖;三是话语策略精细化,部分网络谣言以“知情人士透露”“内部消息”等包装,辨识难度加大。这些特征导致仅靠事后辟谣和行政管控的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因此,如何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构建契合高校实际的网络谣言治理机制,既是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二、高校网络谣言的生成逻辑与传播机理

高校网络谣言的生成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与传播学逻辑。从生成动因看,信息不对称是谣言滋生的根本土壤。高校内部治理信息的公开机制尚不完善,学生对教学管理、评优评先、后勤服务等重大事项的知情权保障不够充分,信息真空为网络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部分师生在遭遇不公或不满时,缺乏制度化表达渠道,转而借助网络“发声”,在情绪驱动的表达中事实往往被扭曲、放大。

从传播动力看,群体认同与情绪感染是谣言扩散的核心推力。高校师生具有高度的社群属性,班级群、社团群、校园论坛等圈层化传播渠道使谣言能够在同质化群体中快速裂变。尤其是涉及公平正义、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时,谣言往往成为群体情绪的宣泄口,传播速度远超事实核查的速度。此外,“宁可信其有”的从众心理和“转发即参与”的行为惯性,进一步降低了谣言传播的心理门槛。

从技术赋能看,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谣言生态。平台算法偏好冲突性、情绪化内容,客观上为谣言提供了流量加持;而AI生成技术的普及则大幅降低了虚假信息的制造成本,“深度伪造”的文字、图片乃至视频使得传统经验判断几乎失效。在这种技术环境下,高校网络谣言的形态更加多样、仿真度更高、传播速度更快,治理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三、当前高校网络谣言治理的现实困境

尽管高校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已积累一定经验,但现有治理实践仍存在明显短板,制约着治理效能的实质性提升。一是“重应对、轻预防”的治理惯性尚未根本扭转。多数高校的谣言治理仍以事后处置为主,依赖舆情监测系统的关键词抓取和人工巡查,缺乏对谣言生成风险的预判和前置干预。当谣言已形成传播规模时才启动应急响应,往往错失最佳处置窗口,陷入“谣言跑在真相前面”的被动局面。二是治理主体单一,协同机制不畅。高校网络谣言治理主要由宣传部门或网络信息中心牵头,教学、学工、后勤等部门参与度较低,院系层面缺乏专门力量。跨部门信息壁垒导致网络谣言溯源困难、处置响应迟缓。同时,高校与地方网信、公安等外部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常态化协作机制,面对跨平台、跨区域的网络谣言传播往往力不从心。三是思政治理的融入程度不够。网络谣言治理在操作层面常被简化为技术管控和信息封堵,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脱节。部分高校未将谣言辨识能力、网络法治素养纳入思政课程实践教学,也未充分发挥辅导员、班主任等一线思政队伍在谣言预防中的“前哨”作用,导致治理停留在“管住嘴”而非“立住心”的浅层。四是技术支撑能力不足。部分高校舆情监测系统智能化水平偏低,对封闭社群、图片视频等非结构化信息的监测覆盖不全;AI伪造内容的识别手段匮乏,专业人才储备不足,技术短板使得治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大打折扣。

四、构建高校网络谣言治理的新机制

针对上述困境,要以系统思维构建“预防—识别—引导—协同”的高校网络谣言治理新机制。一是构建源头预防机制。健全校务信息公开制度,涉及师生切身利益事项做到应公开尽公开、早公开,压缩网络谣言滋生空间。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新生入学教育,开设谣言辨识专题,提升信息鉴别力。发挥辅导员、学生骨干“瞭望哨”作用,实现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报告。二是完善智能识别机制。升级舆情监测系统,引入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AI技术,提升多源异构信息的实时抓取与分析能力。建立校园网络谣言特征库和典型案例库,为智能识别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注重隐私保护,严格限定监测范围与数据使用边界,防止治理本身引发信任危机。三是强化思政治理引导机制。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将谣言治理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在价值判断层面筑牢“防火墙”。善用“校园大V”等正面发声,以权威解读和理性对话对冲谣言的情绪化传播,变“堵”为“疏”,让真相“跑赢”谣言。四是健全协同共治机制。校内建立宣传、学工、教务、后勤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实行归口管理和分级响应;校外加强与属地网信、公安等部门常态化协作,形成跨平台联防联控合力。

【作者系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思政专项研究课题)“网络思政教育视域下的高校网络谣言治理机制研究”(编号:21GXSS054YB)研究成果】

征稿
xxrbll@126.com